

# 齊國的視角——楚漢之際至漢初 幾個重要階段的天下變局之詮釋\*

林聰舜\*\*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 摘 要

齊國的視角，包括從齊國的角度觀看天下，以及聚焦齊國在天下變局中扮演的角色。此一探討可以跳出傳統研究聚焦於關中的歷史詮釋，在角度互換過程中，形成多元角度的視域，理解權力中心與地方的力量如何共構並推進歷史的發展。

本文透過發生在齊國的三個重要事件重新詮釋天下變局，齊國此一爭衡天下的重要力量被凸顯了，田氏兄弟與韓信用齊的得失，以及曹參相齊的意義也得到進一步的理解與詮釋，而聚焦於關中權力中心的傳統歷史詮釋也得到不同視域的補充。而齊地優越的環境與強烈的共同體意識，使齊國在亂世易於割據獨立，但也容易使據齊者產生孤立主義的思維，自外於天下大局，這是齊地特殊的條件與歷史傳統形成的特色，值得治史者注意。

**關鍵詞：**楚漢之際，齊國視角，田橫，蒯通，韓信，曹參

---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齊國的視角：楚漢之際到漢初幾個重要階段的天下變局之詮釋」(NSC 102-2410-H-007-047) 之部分成果。特別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tslin@mx.nthu.edu.tw

## 一、前言

楚漢之際到漢初的天下權力競逐過程中，齊國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但這個重要角色並未得到應有的注意，是以本文將透過齊國的視角，重新解讀楚漢之際到漢初這個急遽變化時代的幾個重大事件。齊國的視角，包括從齊國的地方視角觀看天下大局，以及聚焦齊國在天下變局中扮演的角色。希望透過此一探討，可以跳出傳統研究對這一階段聚焦於關中的歷史詮釋，以地方與權力中心二者互相參照的角度，在角度互換過程中，形成多元角度的視域。

本文也將打破短期政治事件作為分期的考量，從歷史的多次重要發展探討齊地對天下大局的影響，理解曾長期參與天下權力中心角逐，卻未成功的齊國在此一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這裡除了傳統的「自內（中央）而外（地方）」或「自上而下」的視角，另有「自外而內」或「自下而上」的視角調整，以審視逐鹿天下者的政治視野，理解權力中心與地方的力量如何共構並推進歷史的發展。

楚漢之際到漢帝國建立，是個急遽變化的時代，逐鹿天下的權力競逐一直沒有間斷過，司馬遷（145-約 86 B.C.）讀秦楚之際，曾對此一急遽變化的世局發出如下感嘆：

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sup>1</sup>

在楚漢之際的變局中，田榮 (?-205 B.C.)、田橫 (?-202 B.C.) 的田齊對楚漢相爭的勝負，發生極大的影響力；後來韓信 (?-196 B.C.) 王齊，依然左右天下大局。這段齊地影響天下大局的歷史，值得透過齊國的視角，重新認識。

即使到了劉邦稱帝 (202 B.C.) 以後，由於漢帝國初期的權力形態，仍具有皇權與軍功集團、諸侯王「共天下」的性質，<sup>2</sup> 諸侯王不論異姓同姓，仍不安於位，

<sup>1</sup>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 16，〈秦楚之際月表·序〉，頁 915。

<sup>2</sup> 針對此一現象，李開元稱劉邦的皇權是「有限皇權」，漢帝國是「四級制的聯合帝國」。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 249-

甚至有爭霸天下取皇位而代之的野心。因此，從楚漢之際到西漢前期（以景帝時期七國之亂結束為斷）五十餘年之間，<sup>3</sup> 逐鹿天下的權力競逐關係一直維持強烈的緊張性。這段時期天下的政治權力中心，除了極短暫的過渡期，幾乎都以關中地區馬首是瞻，歷來學者對此一階段歷史的解讀，也偏向關中權力中樞者的角度。<sup>4</sup> 然而，不管是楚漢之際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或者是漢初的「共天下」局面，地方王國勢力對天下大局的發展都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一直未掌控權力中心，卻一直扮演參與、影響大局的重要角色的齊國，若加入齊國的視角解讀此一時期的天下變局，會有很多值得進一步發掘的義涵。

由於篇幅關係，本文討論的期間限定在楚漢之際到漢帝國剛建立的劉邦時期，這段期間，齊國一直擁有影響、甚至左右天下大局的雄厚實力，至於它實際發揮了多少作用，端視齊國在天下大局走向中的角色是否被充分認知。齊國是天下權力競逐舞臺上的要角，但用齊者是否將這個角色演得淋漓盡致呢？

本文將先探討齊地強烈的共同體意識以及強大的現實條件，說明齊國爭衡天下的憑藉。接著，將回歸齊國的視角，闡釋田齊曾是影響楚漢相爭的關鍵力量，為何在秦楚之際的大變局中，空擁強齊之資，僅採取觀望的孤立主義政策，因而被歷史新局淘汰，只成就了劉邦的帝業。其次將探討蒯通<sup>5</sup>（生卒年不詳）據齊爭衡天下的三分計，以及韓信「漢終不奪我齊」心態的失策。最後探討劉邦稱帝後，面對齊地此一影響天下穩定的危險因子，如何將其轉化為帝國統治關東地區的重要支柱。在對比之下，齊地影響天下大局的重要性，以及此一階段的歷史發展，都可以得到更深入的解釋。

## 二、形勝富庶之地與特殊的政經文化風俗圈：

### 楚漢之際齊地的共同體意識與爭衡天下的憑藉

楚漢之際齊國能成為左右天下大局的要角，在於齊地具有特殊背景造成的強烈共同體意識，以及強大的現實條件做為憑藉。

260。

<sup>3</sup> 亦即從陳涉起義（秦二世元年，209 B.C.），到七國之亂平定（景帝三年，154 B.C.）。

<sup>4</sup> 即使西楚霸王項羽（232-202 B.C.）定都彭城，他分封天下還是在關中的咸陽進行。

<sup>5</sup> 本名為徹，因與武帝同諱，史家稱為通。《漢書》載：「蒯通……本與武帝同諱。」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 45，〈蒯伍江息夫傳〉，頁 2159。

由於關東地區地理環境的不同以及政經、文化的多元發展，加上春秋戰國長期分裂割據造成的認同差異，即使秦漢已是帝國形態，但關東地區的地方意識仍非常強烈，尤以楚、齊為甚，並造成很大的影響。楚人在秦漢之際首揭反秦義旗，主宰天下大局，陳涉 (?-208 B.C.)、項梁 (?-208 B.C.) 項羽 (232-202 B.C.) 叔侄、劉邦 (?-195 B.C.) 繼踵而起，領導群雄。此外，齊國也一直擁有左右天下大局的雄厚實力。

齊地即使在秦并天下後，仍被視為具有相對差異性與自主性，齊人也仍認同齊應該是一個諸侯國。始皇二十六年 (221 B.C.)，「丞相綰〔生卒年不詳〕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sup>6</sup> 此議雖為李斯 (280-208 B.C.) 反對而不果行，卻反映當時很多人的想法，認為燕、齊、荆東方邊遠地區風土民情不同，須有尊重差異性的治理方式。

秦末反秦戰爭中，以楚人聲勢最大，後來項羽、劉邦救趙入秦，完成「亡秦必楚」的信念。齊則是反秦戰爭中僅次於楚國的力量，秦始皇對關東地區採行的防範措施，即以楚、齊為重點。漢初劉敬（生卒年不詳）進言：「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sup>7</sup> 只提及楚、齊，是看重兩地的地方勢力。劉邦接受進言，高祖九年，「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sup>8</sup> 也是特別看重楚、齊兩地的勢力。

齊地擁有左右天下大局的雄厚實力，楚漢之際逐鹿天下者自然會鼓動齊地的共同體意識，加以利用。田儻 (?-208 B.C.) 反秦自立，擊殺狄令，召豪吏子弟，其訴求為：「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儻，田氏，當王。」<sup>9</sup> 這是訴諸齊地濃厚的故國意識，喚醒齊地父老對秦覆滅齊國不滿的心理，恢復田氏家族治齊的傳統。田儻死於章邯 (?-205 B.C.)，儻弟田榮、田橫相繼奮起，也憑藉了齊應該是一個諸侯國的共同體意識。

韓信下齊，欲自立為齊王，其理由為：「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sup>10</sup> 這是將齊國視為獨立的 political 文化風俗圈，須裂土封王統治。後來蒯通勸韓信據齊自立，三分天下，也是憑藉齊地長期以來的獨立

<sup>6</sup> 司馬遷，《史記》，卷 6，〈秦始皇本紀〉，頁 303。

<sup>7</sup> 同前引，卷 99，〈劉敬叔孫通列傳〉，頁 3276。

<sup>8</sup> 同前引，卷 8，〈高祖本紀〉，頁 482。

<sup>9</sup> 同前引，卷 94，〈田儻列傳〉，頁 3189。

<sup>10</sup> 同前引，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3160。

自主形勢與現實條件，所謂：「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sup>11</sup> 劉邦滅項後，襲奪齊王軍，徙封齊王信為楚王，仍是擔心韓信據齊，容易與朝廷形成對抗之局。韓信徙封王楚，齊地為漢郡；韓信廢為淮陰侯後，復以齊為諸侯，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sup>12</sup> 將齊國由郡縣恢復為諸侯，是認為以諸侯國的統治形態治齊有其傳統，便於撫平齊眾。<sup>13</sup>

齊人在楚漢之際至漢初仍具有諸侯國共同體意識，是長期累積形成的，重要原因如下：

齊自立國以來，即是褒封大國，管蔡作亂，淮夷畔周，成王 (1055-1021 B.C.) 命太公 (生卒年不詳) 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sup>14</sup> 齊立國即擁有特殊的征伐大權，更是周人在東方「制夷」的堅強堡壘。春秋以降到戰國，齊地的人力、物力資源，更是左右天下大勢的關鍵因素。加上桓公 (685-643 B.C. 在位) 霸業、威王 (356-320 B.C. 在位) 「最彊於諸侯」等光輝史蹟，這些光榮傳統有助於型塑齊人的自我認同。

在文化上，齊國在戰國時期已發展成為文化中心，稷下學宮網羅各類人才，盛極一時：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sup>15</sup>

五德終始之說與黃老之學也盛於齊：

<sup>11</sup> 同前引，頁 3163。

<sup>12</sup> 班固，《漢書》，卷 1，〈高帝紀〉，頁 60。

<sup>13</sup> 陳蘇鎮認為，劉邦放棄以天下為郡縣的初衷，與他在關東推行郡縣制遭遇困難有關。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66-76。但將齊恢復為諸侯，即使與在關東推行郡縣制遭遇困難有關，劉邦直至執楚王信後，始封劉肥王齊，應是考慮原為齊王的韓信的感受，避免奪韓信之齊與親子弟，激反韓信。

<sup>14</sup> 司馬遷，《史記》，卷 32，〈齊太公世家〉，頁 1785。

<sup>15</sup> 同前引，卷 74，〈孟子荀卿列傳〉，頁 2837-2838。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sup>16</sup>

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sup>17</sup>

儒術更在齊魯獲得長足發展：

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sup>18</sup>

儒學大師荀子 (313-238 B.C.) 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具體代表儒學重心遷齊的趨勢。<sup>19</sup> 到了漢初，齊地已是儒學與黃老之學兩大主流思潮的中心。

齊國在文化上的優越地位，使齊地人民在秦統一後更不能認同秦帝國的文化控制，激起強烈的反抗。<sup>20</sup> 伴隨「一用秦法」而來的虐刑、改俗、鎮壓，更強化六國遺民反抗、排斥，<sup>21</sup> 其中齊人在文化上的反抗尤其特出。秦統一後，從事非暴力反秦的人物，各國遺民皆有，而以齊國為多，諸如：齊人博士淳于越（生卒年不

<sup>16</sup> 同前引，卷 28，〈封禪書〉，頁 1638。

<sup>17</sup> 同前引，卷 80，〈樂毅列傳〉，頁 2941。

<sup>18</sup> 班固，《漢書》，卷 88，〈儒林傳〉，頁 3591。

<sup>19</sup> 孫家洲認為，齊文化成功吸納周魯文化，使之成為自己的文化主流，實現了齊魯文化在學術上的首先融合，是以秦漢大一統之世，政治中心雖在咸陽、長安、洛陽，但齊魯為禮儀之鄉的特殊地位，始終得到朝野上下的承認。孫家洲，〈論秦漢時期齊魯文化的歷史地位〉，《中國人民大學學報》，4（北京：2001），頁 107-113。

<sup>20</sup> 王子今指出，秦王朝對東方新領土的控制，是通過軍事管制的方式施行的，「大一統」政治體制的形成，是以一種反文化的形式實現的。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頁 5-6。戰國時期齊學的整體發展情況，可參看林麗娥，《先秦齊學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第 3 章〈稷下學之探討〉、第 6 章〈先秦齊學的主要學派〉、第 7 章〈先秦齊學的特色〉。

<sup>21</sup> 工藤元男注意到《睡虎地秦墓竹簡》的《語書》強化全面施行秦法與六國原有價值體系的衝突，《語書》發布於秦王政二十年（227 B.C.），是秦統一六國的大局已定時發布的，基調是鄉俗和秦法的對立，根據秦法推行一元化統治的意志十分突出。工藤元男著，廣瀨薰雄、曹峰譯，《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357-366。陳蘇鎮也特別指出，秦「普施明法，經緯天下」，企圖用秦朝律令刑罰去移風易俗、統一文化，造成的東西衝突，其影響超過賦稅力役太重的因素。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頁 28-37。

詳) 反對以諸侯為郡縣。<sup>22</sup> 秦禁書，秦博士濟南伏生(?-約 161 B.C.) 壁藏《尚書》，漢定，以壁藏《尚書》教於齊魯之間。<sup>23</sup> 齊魯儒生博士譏刺始皇上泰山封禪，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並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sup>24</sup> 齊人徐市(生卒年不詳) 上書求僊人，發童男女數千人，「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sup>25</sup> 東郡隕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sup>26</sup> 陳涉稱王，〈儒林列傳〉云：「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繼云：「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sup>27</sup> 則其中必然多為齊魯儒者。知識文化人才擅於傳播輿論，對反秦事業的推動，大有煽風點火之效。<sup>28</sup> 齊地知識文化人從事非暴力反秦，背後正反映他們對自身文化的優越地位的認同，以此抗衡秦的高壓統治。

在地理形勢與經濟條件上，齊地是四塞自守又富庶的形勝之國，蘇秦(?-284 B.C.) 說齊宣王(319-301 B.C. 在位)：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sup>29</sup>

漢初田肯(生卒年不詳) 建議劉邦：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

<sup>22</sup> 司馬遷，《史記》，卷 6，〈秦始皇本紀〉，頁 321。

<sup>23</sup> 班固，《漢書》，卷 88，〈儒林傳〉，頁 3603。

<sup>24</sup> 司馬遷，《史記》，卷 28，〈封禪書〉，頁 1636、1641。

<sup>25</sup> 同前引，卷 6，〈秦始皇本紀〉，頁 325。

<sup>26</sup> 同前引，頁 326。據《漢書》載，東郡轄 22 縣。班固，《漢書》，卷 28 上，〈地理志上〉，頁 1557。轄地大多屬戰國齊、梁之域。另據勞榘所述，秦之東郡轄東郡、東平、濟陰、山陽，亦位處齊、梁交界之域。勞榘，《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2006)，〈秦郡的建置及其與漢郡之比較〉，頁 367-374。

<sup>27</sup> 司馬遷，《史記》，卷 121，〈儒林列傳〉，頁 3761。

<sup>28</sup> 田餘慶認為，齊文楚武是反秦的主力，齊魯儒生歸附陳王，是齊文楚武的合流。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說張楚〉，頁 3-29。當然，我們不能生硬地把「齊文」解釋為齊地少有武力反秦之事。

<sup>29</sup> 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 8，〈齊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頁 337。

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sup>30</sup>

田肯認為齊是與關中地區並稱為「東西秦」的形勝之地、富饒之國，有爭橫天下的雄厚資本。劉邦認同齊的優越地位，封庶長子劉肥（201-189 B.C. 在位）為齊王。

齊建國於魯中山地北麓的東西大道，臨淄居中控制這條中原通向半島的東西大動脈，成為海內名都。<sup>31</sup> 蘇秦說齊宣王，描述其盛況：

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臨淄之途車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sup>32</sup>

說客之言容或有誇張成分，但蘇秦所言臨淄之富實，應相當接近現實。武帝（141-87 B.C. 在位）時，臨淄人主父偃（?-126 B.C.）就指出：「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sup>33</sup> 1964 年起對臨淄齊國故城的幾次考古發掘，也證實戰國齊都臨淄城郭布局的宏偉與工商活動的頻繁。<sup>34</sup> 臨淄的殷實，當然以齊國富饒為憑藉，「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sup>35</sup> 「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sup>36</sup> 齊統治者又積極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齊更為富足。地理形勢與經濟條件的優越，使齊國長期成為諸侯歸服的對象，太公時，「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sup>37</sup> 四塞的地理形勢帶來的搏聚力，以及

<sup>30</sup> 司馬遷，《史記》，卷 8，〈高祖本紀〉，頁 478。田肯之言，也反映齊人希望齊地由漢郡恢復為諸侯國的立場。

<sup>31</sup> 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視野》（北京：三聯書店，2009），〈淄博市主要城鎮的起源和發展〉，頁 406。另外，葛劍雄指出，考察秦漢時期的經濟狀況，當時最發達的地方是在關東，即燕山山脈以南，太行山、中條山以東，豫西山地和淮河以北地區。西漢末年，這一占全國總面積 11.4% 的範圍內，擁有總人口的 60%。葛劍雄，〈論秦漢統一的地理基礎〉，收入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 6 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頁 127-145。這些資料還是西漢多次向關中移民後的統計資料，而齊地正處於此一精華區的核心。

<sup>32</sup> 劉向集錄，《戰國策》，卷 8，〈齊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頁 337。

<sup>33</sup> 司馬遷，《史記》，卷 52，〈齊悼惠王世家〉，頁 2422。

<sup>34</sup> 群力，〈臨淄齊國都城勘探紀要〉，《文物》，5（北京：1972），頁 45-54；張龍海、朱玉德，〈臨淄齊國古城的排水系統〉，《考古》，9（北京：1988），頁 784-787。

<sup>35</sup> 司馬遷，《史記》，卷 129，〈貨殖列傳〉，頁 3935。

<sup>36</sup> 同前引，卷 32，〈齊太公世家·贊〉，頁 1820。

<sup>37</sup> 同前引，卷 129，〈貨殖列傳〉，頁 3923。



長期為富強之國建立的尊榮感，會有力支持齊人形成地域認同的意識。

不同的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環境造成風俗習慣的不同，《漢書·地理志》云：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sup>38</sup>

這是強調風俗受到水土（自然環境）、君上政教（人文環境）的影響。《史記·貨殖列傳》謂齊：

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sup>39</sup>

嚴耕望 (1916-1996) 解釋這段文字云：「凡此皆見齊國為工商發達、政治自由、民性活潑、學術興盛之大國風範。」<sup>40</sup> 此一解釋更清楚呈現齊國的區域特色以及大國風範。此外，好議論則多異議，不受中央一元化思想宰制；「地重，難動搖」，則安土重遷、認同鄉土；「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則多豪俠，容易形成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成為割據勢力的基礎。<sup>41</sup> 這些風俗都容易產生地域認同以及對中央的離心力。

由此可知，齊地在楚漢之際仍被視為特殊的政治文化圈，齊人有其獨特的自我認同，由此形成強烈的共同體意識。劉邦立劉肥為齊王時，下令：「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sup>42</sup> 可見齊地不但有共同方言，也被視為一個獨特的區域。獨特的共同體意識加上現實條件的優厚，是齊國在楚漢之際的變局中具有關鍵力量的憑藉。

<sup>38</sup> 班固，《漢書》，卷 28 下，〈地理志下〉，頁 1640。

<sup>39</sup> 司馬遷，《史記》，卷 129，〈貨殖列傳〉，頁 3935。

<sup>40</sup> 嚴耕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兼論秦統一天下之背景〉，頁 506。

<sup>41</sup> 秦末起兵的田儋、田榮、田橫，為狄之豪俠，「皆豪，宗彊，能得人。」司馬遷，《史記》，卷 94，〈田儋列傳〉，頁 3189。其中五百門客殉田橫之死的事蹟，史公〈贊〉曰：「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同前引，頁 3195。田橫高節與賓客慕義死節皆有俠義之風，這批任俠之徒也是田氏兄弟割據齊國的基礎。有關游俠在秦漢之際的活躍，以及豪俠作為地方勢力所起的作用，可參見增淵龍夫著，孔繁敏譯，〈漢代民間秩序的構成和任俠習俗〉，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3 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526-563。

<sup>42</sup> 司馬遷，《史記》，卷 52，〈齊悼惠王世家〉，頁 2413。

### 三、田齊的復國與覆亡：

#### 田榮、田橫的孤立自保路線與歷史新局的脫節

獨特的共同體意識加上現實條件的優厚，齊國在陳涉起義後很快復國，但也因滿足於齊地的優越環境，以及強烈的齊地共同體意識伴隨的王國並立的舊世界觀，在楚漢之際的大變局中，空擁強齊之資，僅採取觀望的孤立主義政策，誤認為秦楚之際諸國並立的局面是戰國政治秩序的重現，具有相當的穩定性，未察覺這樣的國際均勢不會持久，即使坐擁強齊，觀望孤立亦將難以自保。舊世界觀的認知與由此而來的路線選擇，使他們無法妥善回應歷史新局，終致覆亡。歷史就是這麼弔詭，齊地的優越環境造就了田氏兄弟的王業，也使他們安於現狀，使他們與歷史新局脫節。

田儋反秦，擊殺狄令後，鼓動齊地的共同體意識，召豪吏子弟，訴求：「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sup>43</sup> 這是訴諸齊應該是一個諸侯國的共同體意識。田氏復國後，面對陳涉起義後的天下變局，面對兩條路線的選擇，一是參與轟轟烈烈的亡秦運動，甚至進一步取得亡秦的領導權，稱霸或稱帝；另一是擁強齊之資，孤立自保。田齊初起時採行前一路線，後來則採行孤立主義路線。

田儋初立時，仍有爭霸天下的企圖：

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sup>44</sup>

是則田儋在陳涉敗亡，項梁崛起之前的反秦活動領導者真空期，企圖以起義軍的盟主自居，認為楚國立新王要徵得齊國同意。後來章邯圍魏王於臨濟，田儋將兵救魏，仍以反秦起義軍的領袖自居，惜為章邯所殺，霸業未成。

田儋死，田榮、田橫相繼奮起，卻一步步走向孤立主義的立場。田榮在項梁奮

<sup>43</sup> 同前引，卷 94，〈田儋列傳〉，頁 3189。

<sup>44</sup> 同前引，卷 48，〈陳涉世家〉，頁 1640。

力解其東阿之圍後，私自脫離抗秦前線，「引兵歸，擊逐齊王假。」<sup>45</sup> 又因田假 (?-205 B.C.) 亡走楚，田角（生卒年不詳）、田閒（生卒年不詳）亡走趙，與楚、趙鬧翻，不願出兵對抗獲得增援的章邯軍，最後項梁兵敗被殺，項羽由此與田榮結怨。此時田榮的路線選擇，是一心一意鞏固內部統治權力，辜負項梁解圍之恩，也不顧秦軍對其他反抗軍的掃蕩，明顯走向據齊自保的路線。

項梁敗亡，章邯、王離（生卒年不詳）圍鉅鹿，兩支最精銳的秦軍會師河北，<sup>46</sup> 起義軍面臨崩解命運，諸侯軍奮勇救趙以自救，救者十餘壁，反秦成敗在此一舉，田榮亦缺席此一戰役，與東方諸侯救趙滅秦的集體命運切割。項羽入關分封天下，在軍功封王的原則下，田榮無功不封。<sup>47</sup>

田榮擁有齊境最強的實力，卻無寸土之封，與項羽的矛盾表面化。他挑戰項羽的分封秩序，并王三齊，又拉攏對項羽分封不滿的陳餘 (?-205 B.C.)、彭越 (?-196 B.C.)，結盟反楚，只想據齊孤立自保的田榮走到與天下霸主項王全面決裂的境地。這是歷史的弔詭，歷史開了田榮一個大玩笑，使他事與願違，但其原因還是可以解釋：田榮在最不恰當的時機，與東方諸侯的集體命運切割，既然與集體利益衝突，想孤立自保是不可能的。

走向據齊自保路線的田榮，卻被迫最先舉起反楚大旗，但並不代表走出孤立的路線，因為此一布局只是一時的自保之計，希望分散項羽攻擊力道，仍不具有放眼天下的眼光，仍是消極性的。田榮最後獨自面對項王自將擊齊的毀滅性報復，以兵敗被平原人所殺告終。設若田榮不走孤立自保路線，不與東方諸侯反秦的集體命運疏離，項羽大封天下時，他在齊地的統治將得到認可。後來楚漢戰起，智勇俱困時，田榮據未受項王摧殘的強齊，伺機進取，齊國發展的可能性難以估量。

漢王趁項王擊齊入彭城，項羽釋齊歸擊漢，田橫得以復國，<sup>48</sup> 瀕於滅亡的齊國絕處逢生，但田橫並未把握短暫的機會，帶領齊國尋找出路。田橫復齊至滅於韓信，三年間恰是楚漢戰爭的決勝期，兩大集團全力拼搏，非你死我活不休，這也是齊國前途發展的關鍵時刻，但田橫仍沿襲田榮孤立自保的路線，坐觀楚漢成敗。<sup>49</sup>

<sup>45</sup> 同前引，卷 94，〈田儋列傳〉，頁 3190。

<sup>46</sup> 章邯軍擊攻入關中的陳涉軍周文部後，東向平叛，擊殺魏咎、田儋、項梁，戰功彪炳。王離軍則是防備匈奴的精銳邊防軍。胡亥詐為始皇詔書，賜死扶蘇、蒙恬，「以兵屬裨將王離。」同前引，卷 87，〈李斯列傳〉，頁 3080。是則王離繼蒙恬為駐紮上郡的備胡邊防軍統帥。

<sup>47</sup> 同前引，卷 94，〈田儋列傳〉，頁 3190-3191。

<sup>48</sup> 田橫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同前引，頁 3192。故本文以齊國此一階段為田橫時代。

<sup>49</sup> 「漢之敗卻彭城……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同前引，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3152。「與楚

甚至當韓信大軍橫掃黃河以北，兵鋒直指趙境，田橫仍未記取秦併六國時趙亡而齊隨之覆亡的歷史教訓，協助曾與田榮結盟的陳餘拒漢。待韓信破趙降燕，田橫在韓信大軍壓境的壓力下，竟異想天開接受酈生 (?-203 B.C.) 勸降，投漢自保，<sup>50</sup> 罷歷下軍守戰備，導致遭韓信偷襲而亡。田橫投漢自保的不切實際作為，出自他誤認劉邦在破楚後會承認已存在的舊勢力，就如同他在楚漢戰爭中據齊觀望，也是誤認楚漢戰後只是霸業的鼎替，舊秩序依然，舊王國的存在仍可受到認可，但歷史新局卻已悄悄移向皇權專制的帝國形態。

就齊國的路線選擇而言，齊、楚雖因矛盾重重導致兵戎相見，但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楚漢戰爭後期，當大形勢產生巨大變化後，田橫應順勢調整其戰略思維。韓信破趙下燕後，漢對楚的大包圍圈逐漸形成，此時田橫更應體會楚亡則齊無法獨存，改變策略與楚修好，協助西楚穩住北線側翼，使項王可以全力在滎陽、成皋前線阻截劉邦，穩住戰局。

齊楚同盟若成立，彭越在梁地的活動少了鄰近的齊國作為依托，就會擠壓其活動空間，<sup>51</sup> 有助項王解決最頭痛的糧食與補給問題，那麼項王在滎陽、成皋前線的優勢就會更明顯。劉邦主力在中原處於劣勢，與河北的漢軍無法串連呼應，田齊來自韓信河北之師的壓力就會減輕。亦即當韓信破趙下燕，漢軍聲勢大張，項王與田齊都已無力單獨對抗漢的進逼，田齊與西楚形勢上已成命運共同體，投漢自保只是自速其滅亡罷了。

田橫投漢罷兵，空置數十萬雄師，連一場像樣的會戰也未開打就滅亡，像極齊王建 (264-221 B.C. 在位) 未抵抗就亡於秦，觀望的孤立主義路線終究不能自保。齊因宣王伐燕、湣王 (301-284 B.C. 在位) 滅宋，過度向外擴張，招來列國圍攻，兵敗濟西，燕師直入臨淄，幾致亡國。襄王 (283-265 B.C. 在位) 復齊之後，不再對外爭取領土，王建更因遠懸東土，方便執行孤立主義政策，在秦併六國的過程

---

和」是畏懼求和，不是合作結盟。

<sup>50</sup> 「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同前引，卷 8，〈高祖本紀〉，頁 469。「廣叛楚」同樣不能解讀為齊本來歸降楚，而是指彭城之戰後，齊畏楚求和，而項羽此時在滎陽、成皋戰線脫身不得，也對齊國無可奈何。

<sup>51</sup> 彭越曾接受田榮的將軍印，與齊國有特殊關係。且彭越在梁地打游擊，絕楚糧道，是楚漢戰爭成敗的關鍵，而彭越活動區域鉅野、睢陽、外黃、昌邑等，都距齊不遠，特別是鉅野、昌邑一帶，已與齊接壤。同前引，卷 90，〈魏豹彭越列傳〉，頁 3126-3127。錢穆曰：「漢山陽郡治昌邑，今金鄉縣西北四十里。」錢穆，《史記地名考》，收入《錢穆先生全集（新校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 587。是則昌邑及接壤的鉅野都在今山東境內，彭越在此地對楚的騷擾活動，借助於田橫的齊國作為依託，才能免於腹背受敵。

中，坐觀天下成敗，「齊亦東邊海上……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sup>52</sup> 攸關天下均勢能否維持的長平大戰，趙無食，請粟于齊，齊王漠視唇亡齒寒之禍，未伸援手。趙覆軍長平，秦兵圍邯鄲，楚、魏救趙，齊仍袖手旁觀。待秦一步步消滅群雄，孤齊已無力反抗，史公評斷：

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sup>53</sup>

劉邦削平群雄，恰是憑藉秦之故資，在形勢上今日之漢即昔日之秦，是秦統一天下歷史的重演。<sup>54</sup> 當劉邦在楚漢戰爭中已取得上風，吞併天下之勢隱隱然形成，此時田橫擁富足之齊，應記取齊亡於秦的教訓，充當抗漢前線的趙國的後援，並協助西楚穩住北線側翼，而助趙、助楚正所以自救。然田橫不此之圖，在觀望中流失三年黃金時間，待楚漢戰爭進入尾聲，只有任人宰割了。降漢之後，縱使韓信未用蒯通計，襲破歷下軍，田橫被擊滅的下場也不會改變。如同降漢的燕王臧荼，苟延殘喘數月後，一樣逃不了遭漢擊滅的命運。

齊地的共同體意識與現實條件的憑藉，使田氏在陳涉反秦後很快復國，但齊國優越的環境與強烈的區域共同體意識，卻使田榮、田橫容易滿足於據齊稱雄，自外於天下大局，這是齊地特殊的條件與歷史傳統形成的孤立主義思維的重現。<sup>55</sup> 優

<sup>52</sup> 司馬遷，《史記》，卷 46，〈田敬仲完世家〉，頁 2292。

<sup>53</sup> 同前引，頁 2292-2293。

<sup>54</sup> 此一觀點學界論者極多，例如李偉泰，《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論述稿》（臺北：長安出版社，1985），〈試論漢初「秦本位政策」的成立〉，頁 1-22。李開元指出，楚漢戰爭中，舊秦國籍士卒，已構成漢軍主力。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頁 170-172。陳蘇鎮提及劉邦集團據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頁 38-65。

<sup>55</sup> 陳蘇鎮認為，齊之反秦，除了田假、田儋兩支貴族、豪強勢力的活動外，看不到齊地下層社會有何積極反應，齊人贊成反秦，但無意於亡秦，目的只是復國。所以齊不接受楚為縱長，亦不積極參與滅秦，這一現象不能全從田儋兄弟身上索解，齊地下層社會對反秦戰爭的態度應當是更為根本的原因。陳蘇鎮，《兩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天下苦秦」辨〉，頁 3-14。此一論點雖忽略田儋與繼起的田榮、田橫抗秦態度的不同，但可強化本文主張的，齊地的共同體意識與現實條件的憑藉形成孤立主義的論述。當然，身為齊地領袖的田榮、田橫，必須具有超越下層社會侷限於復國自保的戰略眼光，這是他們無法逃避的責任。另高明士認為，戰國以來是用人頭統治作為新的王（皇）權統治原理，此事若充分達成，獨裁政治會提早實現，但新的社會力在戰國至秦朝時期以新興的豪族來展現，後來又發展成政治力與社會力的妥協，阻礙獨裁政治的提早實現。高明士，《中國中古政治的探索》（臺北：五南圖書，2006），〈導言——漢唐間為「中古」的初步看法〉，頁 9-10。此一有關地方社會力存在的解釋，有助於

越的齊國是田氏兄弟寶貴的資產，卻也是他們爭衡天下的包袱。

此外，田榮、田橫具有類似戰國時期封建王國並立的舊世界觀，不能洞察楚漢之際諸侯並立的局面是暫時性的，王國獨立的局面很快會被打破，於是滿足於齊地的主控權，缺乏放眼天下的格局。但孤立主義路線，無法存活於天下底定之後，歷史不斷複製孤立自保者的悲歌。兩漢之際公孫述 (?-36) 策士荊邯 (生卒年不詳) 勸公孫述毋蹈隗囂 (?-33) 孤立自保覆轍，批評隗囂不能掌握時機爭天下，妄想永遠割據稱王，等到劉秀 (6 B.C.-57) 統一天下的大局已定，滅亡是必然的。荊邯曰：

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趁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令漢帝釋關隴之憂……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sup>56</sup>

齊地的共同體意識與現實條件的憑藉，以及誤認王國可以穩定持久存在的舊的政治秩序觀，使田榮、田橫走向據齊自保的孤立主義路線，在亂局中一無進取，坐觀天下成敗，待中原霸權角逐的贏家底定，富足的田齊也難以獨存了。「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sup>57</sup> 實則歷史告訴我們，「俱南面稱孤」必然是短暫的，歷史即將出現新局，妄圖孤立自保，最後連「為亡虜而北面事之」恐怕也不可得了。

#### 四、蒯通據齊爭衡天下的三分計，與韓信「漢終不奪我齊」的失策

楚漢戰爭進入尾聲時，齊國一度有機會登上天下政治舞臺的中心，中國的天下三分之局可能提早四百餘年出現。

---

理解秦朝統治下，齊地與關東地區豪彊起而參與反秦戰爭的現象。田儋兄弟即為具舊貴族身分的地方豪彊。勞榘另指出，構成豪彊的主要條件，一是經濟力量，二是政治背景，齊諸田所以能成為豪彊，還是基於舊貴族身分而來的私有財產以及社會上的殘餘地位和社會影響力。勞榘，《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漢代的豪彊及其政治上的關係〉，頁 295-316。

<sup>56</sup>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 13，〈隗囂公孫述列傳〉，頁 539。

<sup>57</sup> 司馬遷，《史記》，卷 94，〈田儋列傳〉，頁 3194。

楚漢戰爭後期，逐漸形成以齊地為中心，左右項羽、劉邦成敗的韓信勢力。韓信在漢敗於彭城，諸侯復反漢與楚合的不利形勢下，迅速領軍破河東地區的魏王豹(?-204 B.C.)，化解劉邦集團崩解退守關中的危機，繼而滅代、破趙、下燕、滅齊，南摧龍且救齊二十萬大軍，要挾劉邦立為齊王。這時韓信名義上雖歸屬漢王，但黃河以北地盤是他打下來的，所轄部隊主要收編自敵方陣營，<sup>58</sup> 已逐步發展成脫離劉邦控制的力量。<sup>59</sup> 項王知道只有策動齊王韓信反漢，才能突破漢在戰略上的包圍，於是派武涉（生卒年不詳）遊說韓信，武涉提出「參分天下王之」的戰略思考，<sup>60</sup> 但他充當敵對陣營說客的立場，不易取得信任，所以韓信立刻拒絕。<sup>61</sup>

遠比武涉勸韓信反漢更早，蒯通從齊國的視角放眼天下，看到齊國非比尋常的重要性，在韓信下齊前就敏銳看到憑藉齊國操縱天下大勢的可行性，想將齊國推向天下的中心。蒯通具有戰國縱橫家的特質，<sup>62</sup> 有對天下大勢發展的敏銳觀察與策略，韓信破趙、下燕後，他發覺操縱天下局勢的機會來臨了，就著手布局三分天下大計。<sup>63</sup> 蒯通三分策略的第一步是幫韓信取得強大的根據地，當時韓信大軍直壓齊境，齊在壓力下接受漢王使者酈食其勸降，韓信欲止軍。蒯通看到項羽將滅，韓信功多而未有地盤，勸韓信繼續進軍，武力滅齊：

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  
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

<sup>58</sup> 韓信的作戰模式很少採用攻堅血戰，而是用謀略暴露敵方弱點，摧枯拉朽擊潰之，所以既不太消耗己方兵力，兼可收編敵方有生力量，出陳倉、襲安邑、背水陣、戰龍且都是典型戰例。所以韓信兵團不但愈戰愈旺，還有多餘兵力支援劉邦的滎陽、成皋戰線需求。「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同前引，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3152。「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同前引，頁 3158。

<sup>59</sup> 韓信欲自立為齊王，劉邦雖怒，但無力阻擋，只好妥協，「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同前引，頁 3160。

<sup>60</sup> 同前引，頁 3161。

<sup>61</sup> 吳見思比較武涉與蒯通說辭，謂：「一則句句是為項王，一則句句是為韓信，寧可以道理計哉！」吳見思評點，《史記論文》（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淮陰侯列傳〉，頁 503。

<sup>62</sup> 「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將蒯通歸類為戰國縱橫家一類的人物。班固，《漢書》，卷 45，〈蒯伍江息夫傳〉，頁 2167。

<sup>63</sup> 林伯桐認為，蒯通說淮陰侯之言，即武涉說淮陰侯之言，其論天下之大勢略同，「事機所在，智者所見略同，然能言之而不能必其見聽也。」林伯桐，《史記蠡測》，收入張新科主編，《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第 1 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5），頁 39。此一論點看到蒯通、武涉說淮陰侯之言相似處，而「事機所在，智者所見略同」，等於認同就韓信個人成敗考慮，據齊三分天下是最好的選擇。

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sup>64</sup>

具有縱橫家特質的蒯通，期待的是多股勢力爭衡天下，才有操縱天下大局的舞臺，他挑動韓信對酈生偷走下齊功勞的不滿情緒，而滅齊也符合韓信據齊稱王的願望，所以韓信接受蒯通建議，渡河襲齊歷下軍，遂降平齊。韓信據齊後，控制形勝富庶之地，手握數十萬雄兵，左右天下大局的力量更為明顯。

韓信、蒯通偷襲已降之齊，此舉頗受後人非議。<sup>65</sup> 但此一事件要放到攸關天下大勢發展的齊地歸屬權引發的多方角力的情境去看，當時劉邦、項羽、韓信、蒯通、田齊各有各的盤算，各方勢力都站在自己的立場操作齊國的發展，蒯通操作三分計，建議韓信襲齊，是多方角力背景下的一環，實不必單獨對他們施以道德性的譴責。回歸當時的情境，韓信在破趙後，遣使報漢，請立功勞遠不及己的張耳 (?-202 B.C.) 為趙王，雖曰張耳曾是項羽分封於趙地北部的常山王，但韓信更是傳達有大功則封王的默契給劉邦；劉邦接受韓信之請而封張耳，表示他接受與功臣共分天下的原則。韓信下齊後封王，劉邦雖心不甘情不願，卻是履行雙方的約定，是共分天下原則的執行。韓信擊齊，齊必不支，劉邦卻遣酈食其下齊，使田橫仍得據齊，這明顯是防範韓信坐大，否則何不滅齊納入版圖？酈食其下齊，本來韓信唾手可得的滅齊之功被劉邦、酈生偷走了，他自然容易聽蒯通之勸，奪回本屬自己的功勞與地盤。

韓信滅齊後，項王根據地暴露在韓信兵團的攻擊範圍，毫無還手之力，若韓信繼續進軍滅項，楚漢戰爭將很快結束，天下定於一。屆時韓信與劉邦的關係將淪為被動，任劉邦宰割。所以蒯通三分計的第二步是勸韓信背漢自立，迫燕脅趙，爭衡天下。蒯通先藉相術旁敲側擊切入，反覆勸說，將韓信除背漢自立外，已無他路可走的處境講得極為透徹，<sup>66</sup> 更擘畫出韓信據強齊三分天下後的光明遠景：

<sup>64</sup> 司馬遷，《史記》，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3159。

<sup>65</sup> 「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同前引，卷 94，〈田儋列傳·贊〉，頁 3195。「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雋，其得不烹者，幸也。」班固，《漢書》，卷 45，〈蒯伍江息夫傳·贊〉，頁 2189。後人如茅坤曰：「聽蒯通一計……信平生用兵此為失策。」屠隆曰：「淮陰之死，論者冤之，予謂淮陰有取死之道焉。……天故假手呂氏為酈生報仇耳！」凌稚隆輯校，李光縉增補，有井範平補標，《補標史記評林》（臺北：地球出版社，1992），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2214-2215，李光縉增補引。

<sup>66</sup> 劉辰翁稱許此文，曰：「取譬反覆，極人情所難言，此文在漢初第一。」有井範平補標，《補標史記評林》，頁 2220，李光縉增補引。



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sup>67</sup>

齊國優越的條件與地理形勢成為韓信爭橫天下的雄厚資本，加上韓信軍團的實力，<sup>68</sup>以及韓信卓絕古今的軍事指揮能力，蒯通對天下鼎足後遠景的擘畫相當具有實現的可能性。此時雖有劉邦心腹舊部曹參 (?-190 B.C.)、灌嬰 (?-176 B.C.)、傅寬 (?-190 B.C.) 等將領在韓信麾下，對韓信動向具有監視作用，但韓信在齊地享有絕對權力，在軍中具有崇高威望，<sup>69</sup> 曹、灌之徒事實上難以牽制韓信的動向。所以司馬遷也直接表明天下大勢發展繫於韓信一念之間：「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sup>70</sup>

在策士蒯通的擘畫下，齊國一度有機會成為天下政治權力的中心，扮演類似戰國、秦漢時期關中地區的角色，但此一稍縱即逝的機會在韓信手中溜走了。蒯通據強齊、鼎足爭衡天下的分析有其煽動性，所以韓信一度猶豫動搖，但終究不忍背漢。後來世局的發展果不出蒯通所料，韓信也不幸走向蒯通預見的兔死狗烹下場。劉邦倒是深知齊國在天下大局中的關鍵地位，以及韓信控制齊國對自己帶來的威脅，垓下滅項後，還至定陶，立刻故計重施，馳入齊王壁，奪其軍。奪軍後，劉邦

<sup>67</sup> 司馬遷，《史記》，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3162-3163。

<sup>68</sup> 韓信在齊國擁有多少兵力，史無明文記載，或可參考垓下會戰時韓信直接指揮的兵力。《史記·高祖本紀》載：「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同前引，卷 8，〈高祖本紀〉，頁 473。淮陰侯自將的三十萬兵力，以及為韓信部將的左右翼孔將軍、費將軍兵力，其主力應為韓信由齊國帶來參戰的兵力，因為韓信採取的策略是詐敗吸引項羽攻擊，使項羽進入韓信預先設好的圈套，「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同前引。此一誘敵深入的險著，成敗關鍵在偽敗的退卻中，依然能再站住陣腳阻敵前進，才有合圍的機會。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史漢比較研究之一例〉，頁 488-489。由於需在退卻中再站住陣腳，若主力由諸侯雜牌軍充當，風險甚大，非得由韓信直屬部隊擔當不可。是則韓信在齊國擁有的兵力不但遠超過項王，也超過劉邦。

<sup>69</sup> 曹參攻城野戰之功最高，司馬遷給他的評價卻是：「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司馬遷，《史記》，卷 54，〈曹相國世家〉，頁 2453。此謂曹參之功完全依賴韓信而來，且完全籠罩在韓信的光芒之下，及信已滅，才把「與淮陰侯俱」得到的戰功歸給他。此一評價，很生動地呈現韓信在軍中崇高的聲望。

<sup>70</sup> 同前引，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3162、3165。

才放心將韓信改封楚王，改封的表面理由雖是：「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sup>71</sup> 但比較劉邦原先承諾齊地之外加封給齊王韓信的地盤，韓信的封地明顯縮小了。「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sup>72</sup> 此一加封是除了齊舊地，另包含今蘇北的楚地、今河南東南部的廣大地盤，韓信改封楚王後齊舊地被奪，地盤明顯縮水了。尤其喪失了經營一年多，擁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與優越地理形勢的齊國，改封到項羽舊地盤的淮北，不只諸多條件遠不如劉邦原承諾以齊為中心的封地，就國後撫循原效忠項王的楚眾又要耗盡心力，而劉邦早已準備好以謀反的罪名下手了。

韓信臨斬，感嘆：「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sup>73</sup> 可見他也認為採用蒯通之策，據強齊爭衡天下，是可行的謀略。然由於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可能改變楚漢戰爭結局的三分謀略，遂告胎死腹中，<sup>74</sup> 而中國的三分之局也就未能在楚漢戰爭時提早出現。後來，蒯通每讀樂毅（生卒年不詳）〈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sup>75</sup> 蒯通之泣，應是嘆萬事具備，只待韓信點頭的三分計落空；更嘆臨事不決的韓信，終究難逃免死狗烹吧！《三國演義》前身《全相平話三國志》有司馬仲相作陰君，斷陰間公事的故事，曾勸韓信據齊爭衡天下的蒯通轉生琅邪郡，為諸葛亮（181-234）。<sup>76</sup> 是則在《全相平話三國志》作者眼中，蒯通對韓信提出的據強齊三分天下之策，對天下大勢發展的睿識遠見，等同諸葛亮〈隆中對〉提出的三分計，只是蒯通之計落空了，小說家看出了蒯通三分計的原創性，就把完成天下三分的關鍵人物諸葛亮視為蒯通的轉世。

劉邦遣酈食其下齊後，韓信仍進軍滅齊，並自請立為齊王，可見韓信對據齊稱王的渴望。但對於蒯通據強齊爭衡天下的三分計，韓信一度猶豫動搖後拒絕了。韓信拒絕叛漢爭天下，最關鍵的原因是他相信「以天下城邑封功臣」<sup>77</sup> 為核心的裂土分封秩序是穩定的，也就是類似戰國時期王國並立的舊政治秩序會延續下來。所

<sup>71</sup> 同前引，卷 8，〈高祖本紀〉，頁 474。

<sup>72</sup> 班固，《漢書》，卷 1，〈高帝紀〉，頁 49。

<sup>73</sup> 司馬遷，《史記》，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2628。

<sup>74</sup> 呂祖謙言：「看馳入信壁奪其軍，便合知自立。」直捷點出韓信、劉邦勢難兩立，據強齊爭衡天下，才有生路。呂祖謙，《兩漢精華》，收入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第 7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頁 110。

<sup>75</sup> 司馬遷，《史記》，卷 80，〈樂毅列傳〉，頁 2436。

<sup>76</sup> 瀧本弘之編，《全相平話五種》，《中國古典文學插畫集成》第 6 冊（東京：遊子館，2009），《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三卷（元建安虞氏刊本），卷之上，頁 358-359。

<sup>77</sup> 韓信在漢中登壇拜大將後，向劉邦提出的東向爭權天下的計策之言。司馬遷，《史記》，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3150。這是號召豪傑、爭權天下的計策，也是韓信這類豪傑之士的願望。

以他才會一廂情願地認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劉邦在楚漢戰爭中一度在關東地區策略性地與異姓王共分天下，更讓韓信誤認劉邦也認同此一政治秩序。舊世界觀造成的盲點，讓韓信誤認諸侯王與劉邦可相安於此一政治秩序，遂安於齊、滿足於齊，未察覺歷史已出現新局，裂土分封的舊世界將逐步消逝。因而也就未能警覺「功多」，且割據大國，恰是取死之道，遂譜出兔死狗烹的悲歌。韓信由舊世界觀而來的對自己政治角色定位的錯誤認知，使這位享有「國士無雙」美譽的謀略家，<sup>78</sup> 淪為現實政治鬥爭中的失敗者。<sup>79</sup>

蒯通勸韓信據強齊爭衡天下的三分計，凸顯了齊國足以登上天下政治舞臺中心的雄厚資本，而功蓋天下的韓信滿足於齊王的地位，也可以看出齊國特殊地位的吸引力。另外，劉邦在垓下滅項後，立即馳入齊王壁，奪其軍，將韓信改封楚王，也可以看出劉邦對韓信據有強齊的不安。這些事實都證明齊地的人力、物力資源以及地理形勢，確實是爭衡天下的有力憑藉，也是野心家亟想操弄的雄厚資本。韓信一度有機會據強齊爭衡天下，改變楚漢戰爭大局，但此一機會在猶豫中溜走了。

從戰國晚期到西漢，關中地區一直是天下政治的中心，關中的重要性也一直被強調，似乎控制關中是稱雄天下的必要條件。<sup>80</sup> 關中的形勝地位固無可疑，但長期成為天下的政治中心，是其金城天府條件的必然發展呢？或者還要加入一些歷史的偶然因素？歷史走向若改變，天下的政治中心是否非關中莫屬呢？蒯通勸韓信據強齊爭衡天下，使齊地一躍而為天下政治中心的謀略雖失敗了，卻使齊地成為天下政治中心的可能性成為一個替代的選項，值得我們對此一問題做進一步的思考。

## 五、曹參相齊的戰略佈局：

### 東西對抗形勢下，劉邦控制關東的支撐點

劉肥王齊與曹參相齊的戰略佈局，是劉邦在關東重鎮擺下的重要棋子，是漢帝

<sup>78</sup> 蕭何對韓信的評價。同前引，頁 3149。韓信在漢中對蕭何進言，「何奇之」，以及拜為大將時對天下大局的分析，都表現出超越軍事才華之外的政治謀略。

<sup>79</sup> 林聰舜，〈韓信的〈漢中對〉——高明的政治謀略與致命的舊世界觀之表露〉，收入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編，《司馬遷與史記論集》第 8 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 88-101。

<sup>80</sup> 例如秦統一天下、楚漢戰爭劉勝項敗，甚至漢朝初期對關東諸侯王的成功控制，論者常由是否控制關中作為成敗的重要因素。

與諸侯王共天下，延續戰國以來關東關西對抗的形勢下，<sup>81</sup> 將齊國經營為控制關東的支撐點。加上高帝九年 (198 B.C.)，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可以看出劉邦看出齊地在關東的特殊地位，在經營齊地上，用了很多心思。

項羽覆亡後，漢王剛即皇帝位，就匆忙以齊王韓信習楚風俗為由，徙封為楚王，可以看出劉邦對齊國的重視，不願意齊國繼續由威震天下的韓信控制。但齊地廢王國為郡，處在東方強大的諸侯王國中，無異吸引諸侯王垂涎三尺的肥肉，若關東有變，齊地根本無法自守，反成為反叛勢力的囊中物，誠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於是在六年 (201 B.C.) 十二月，用陳平 (?-178 B.C.) 計，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後，接受田肯建議，認為齊與秦中是可相抗衡的「東西秦」，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乃以齊之六郡七十三縣立長庶男劉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sup>82</sup> 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

更值得注意者，劉邦安排列侯中攻城野戰之功最多的曹參為齊相國，<sup>83</sup> 輔佐劉肥，負責齊國的實際治理工作。史家注意到曹參治齊，「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以及蕭規曹隨，將黃老治術用到漢帝國等治績。<sup>84</sup> 其實劉邦任用曹參為齊相國，是重要的戰略佈局，是將能征慣戰的心腹重臣擺到遙遠的關東重鎮，做為牽制關東諸侯王勢力的妙著，這就反映劉邦對齊國的格外看重。

<sup>81</sup> 漢之取天下，得助於異姓同盟軍領袖之力甚鉅，故天下初定，大封異姓為王，關東儼然形成割據之局。後來同姓諸侯王雖陸續取代異姓諸侯王，這些諸侯王強大依舊，「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司馬遷，《史記》，卷 17，〈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頁 962。一直到景帝弭平七國之亂，關西、關東對抗的局勢才漸緩解。而朝廷對關東諸侯王國也極力防範，大致頒布於漢初高祖時期至呂后二年的《二年律令·津關令》，提及武關、函谷、臨晉等五關以及河津之設，以區隔關中、關外。對於無符傳出入津關、出黃金及銅關外、私買關中馬匹車乘以出津關等，皆有嚴格的管制與懲罰。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二年律令·津關令》，頁 83-88。另外，《二年律令·賊律》：「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及守乘城亭障，諸侯人來攻盜，不堅守而棄去之若降之，及謀反者，皆要〔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同前引，《二年律令·賊律》，頁 7-16。這是朝廷將關東諸侯國視為敵國來防範的確實證據。有關津關之設的進一步討論，楊建分析五關布局是為了確立漢對山東諸侯國的優勢而設立的制度，見楊建，《西漢初期津關制度研究：附〈津關令〉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2 章〈津關布局與關中區域〉，頁 42-43。黎明釗另具體析論五關的作用及其與諸侯王的關係，見黎明釗，〈津關令與江湖盜賊〉，收入黎明釗編，《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 365-408。

<sup>82</sup> 司馬遷，《史記》，卷 8，〈高祖本紀〉，頁 479。

<sup>83</sup>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同前引，卷 54，〈曹相國世家〉，頁 2450。

<sup>84</sup> 同前引，頁 2450-2452。

曹參，沛人，是豐沛舊部的核心人物，也是劉邦最信任的重臣之一，後隨韓信下魏、代、趙，並以右丞相屬韓信擊齊：

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sup>85</sup>

垓下會戰時，韓信自將與劉邦會師，命曹參留齊經營，「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sup>86</sup> 是則曹參參與韓信平齊戰役，有其軍事威望，又有經營齊國經驗，是最適合擺到遙遠的關東重鎮，能獨當一面治理齊國，又能做為漢帝國關東地區方面之寄的不二人選。

曹參封為齊相國時，最可怕的楚王韓信雖已就擒，但劉邦對淮南王黥布 (?-195 B.C.)、梁王彭越等具有龍蒸雲變能力的異姓王仍如芒刺在背，曹參擺到關東大國齊國，正可對梁國形成夾擊之勢，形勢上會使彭越不敢輕舉妄動，並可藉齊國與關中遙相呼應的戰略形勢遙控燕、韓、趙、淮南。劉邦下了曹參治齊這記妙著，天下局勢頓形開朗，蠢蠢欲動的諸侯王皆在指麾掌握之中了。果然，曹參相齊產生重大作用：

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sup>87</sup>

陳豨 (?-195 B.C.)、黥布反，劉邦都得自將親征，才能弭平亂事，反叛聲勢可謂浩大。兩場平叛戰役，曹參都親率齊軍參戰。趙相國陳豨反代地，出乎劉邦意料之外，<sup>88</sup> 曹參率齊軍帶來可靠的戰力，防堵陳豨將張春軍攻入齊地，<sup>89</sup> 擴張聲勢，

<sup>85</sup> 同前引，頁 2448。

<sup>86</sup> 同前引。

<sup>87</sup> 同前引，頁 2449。

<sup>88</sup> 「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同前引，卷 8，〈高祖本紀〉，頁 483。

<sup>89</sup> 「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同前引，頁 484。

發揮劉邦將他擺到齊國坐鎮的作用。此時關東諸侯擁兵觀望，劉邦政治性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以為將，拉攏趙人，左右諫，上曰：「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sup>90</sup> 可見劉邦平陳豨的戰力，除了關中兵與就地徵調的邯鄲兵力外，最倚賴的就屬曹參統率的齊軍了。<sup>91</sup>

平淮南王黥布之役，齊軍出動了車騎十二萬人，在楚漢戰爭結束，軍隊復原的狀況下，<sup>92</sup> 齊軍幾乎是傾巢而出了。此役黥布來勢洶洶，并荊、楚，與劉邦親征大軍遇，「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sup>93</sup> 黥布軍的聲勢對劉邦的心理造成巨大威脅。亂事最後雖告平定，但中央為此全力動員：

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sup>94</sup>

發卒屯霸上為皇太子衛，是擔心黥布軍突破漢軍防線，攻入關中，預先部署首都防禦，這部分調遣了包括邊防軍在內的上郡、北地、隴西車騎。赦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又徵諸侯兵，則是整個帝國總動員了。大戰時，劉邦親冒矢石，為流矢所中，回長安後即崩逝，可見布軍戰鬥力之強大，戰況之慘烈，非主帥臨陣冒險難以取勝。從這些情況研判，設若齊軍未出動車騎十二萬的龐大軍力參戰，漢軍想順利平叛，將更為艱辛。<sup>95</sup>

另外，黥布反，故楚令尹薛公在劉邦面前預估黥布的戰略部署，提及黥布的

<sup>90</sup> 同前引，卷 93，〈韓信盧綰列傳〉，頁 3183。

<sup>91</sup> 與高祖同里，最受親幸的燕王盧綰，在陳豨反時，初亦擊其東北，後與匈奴、陳豨勾結。同前引，頁 3180-3181。

<sup>92</sup> 「〔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家。」同前引，卷 8，〈高祖本紀〉，頁 475。

<sup>93</sup> 同前引，卷 91，〈黥布列傳〉，頁 3143。

<sup>94</sup> 班固，《漢書》，卷 1，〈高帝紀〉，頁 73。

<sup>95</sup> 關東諸侯王的問題，劉邦必然先有全盤考量，是以有曹參相齊的布局。以黥布之叛為例，雖有「妒媚生患」的導火線，但絕不是偶然，故楚令尹薛公所謂：「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司馬遷，《史記》，卷 91，〈黥布列傳〉，頁 3141。賈誼（200-168 B.C.）後來以「形勢」看藩國問題，見識非常敏銳。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 1，〈藩強〉，頁 39-42。曾國藩（1811-1872）論史公之評黥布：「如韓、彭、英布之智力，自有不能與高祖並立之理，即鬻端發自愛姬，亦不足論。此等〈贊〉，子長似不甚屑意。」認為韓、彭、黥布之智力卓絕，很難與劉邦和平共存，委婉批評史公〈黥布列傳〉的〈贊〉語。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史記》，收入張新科主編，《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第 1 輯，頁 79。

「上計」是：「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sup>96</sup> 黥布後來并荊、楚，即薛公所言「東取吳，西取楚」。接著是否「并齊取魯」，依薛公之見，是黥布成敗關鍵，這是看重齊魯（即齊國）掌控權對雙方的重要性。薛公預測黥布最後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其理由為：「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sup>97</sup> 此一判斷得到劉邦認同，故封薛公千戶。這時攻城野戰之功最多的曹參在齊，勢必會對黥布是否「并齊取魯」的決心產生重大干擾。黥布雖未將曹參放在眼內，<sup>98</sup> 但曹參畢竟是沙場宿將，齊又是大國，「并齊取魯」勢必得大費周折，甚至在齊國陷入泥淖，淮南國資源不足，不利持久戰，這是黥布必然要思考的形勢。<sup>99</sup> 所以黥布廢「上計」，恐怕不只是「布故麗山之徒也」的性格因素。曹參坐鎮齊國，對阻止黥布採行朝廷懼怕的「并齊取魯」戰略部署，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曹參採用黃老之術治齊，以及為漢相國「蕭規曹隨」，是膾炙人口的故事。但採黃老之術治齊，除連年戰亂後休養生息的需要外，另有一重要原因：曹參看到齊國是特殊的政經文化風俗區域，須有尊重差異性的治理方式，降低帝國統治此一關東重要王國的緊張性。所以曹參上任，「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sup>100</sup> 「如齊故俗」，是尊重齊國的差異性，也正是「安集百姓」的重要工作。《史記·曹相國世家》載：

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sup>101</sup>

黃老之術是清靜不擾，尊重齊地風俗民情的特殊性，以安集百姓的治理方式；也是尊重齊地的風俗民情，不強力干預既成秩序的放任政策。〈曹相國世家〉中記

<sup>96</sup> 司馬遷，《史記》，卷 91，〈黥布列傳〉，頁 3141。

<sup>97</sup> 同前引。

<sup>98</sup> 「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同前引，頁 3142。

<sup>99</sup> 「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後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陳亮雖未納入曹參相齊的因素，但看到黥布「并齊取魯」的困難度，等於看到了齊國的重要性。陳亮，《陳亮集》（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6，〈酌古論·薛公〉，頁 63-66。

<sup>100</sup> 司馬遷，《史記》，卷 54，〈曹相國世家〉，頁 2450。

<sup>101</sup> 同前引。

載很多這類的曹參治齊作風：「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終莫得開說。」「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以及與惠帝「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的政治方向的對話。<sup>102</sup>

齊國經過起義反秦以後的戰禍，以及項羽、韓信的兵災摧殘，必然是殘破不堪，曹參以齊國作為黃老清靜無為思想的實驗基地，得到相當大的成效，「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此外，曹參在齊國這個文化高度發展又具有地域特色的地區，又能禮賢下士，廣泛拉攏知識分子，對異議分子也用心爭取，「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sup>103</sup> 曾經勸韓信據齊爭衡天下的蒯通，也成為相府座上賓了。曹參在政治上、文化上，用心爭取齊國人認同，穩定了帝國的東方基礎，也使齊國成為穩定帝國統治的重要力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黃老之學是發揚於齊地的思想，與齊地有濃厚的血緣關係，採黃老之術治齊，更能表現尊重齊國文化思想的治理態度，在一統的帝國環境中容許區域差異的存在。《史記·樂毅列傳》載：

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sup>104</sup>

這段記載明白點出黃老之學的師承傳授，以及樂臣公一系在齊國發展的情況。再往前推，稷下先生中有很多黃老學者：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sup>105</sup>

<sup>102</sup> 同前引，頁 2451-2452。

<sup>103</sup> 班固，《漢書》，卷 45，〈蒯伍江息夫傳〉，頁 2166。

<sup>104</sup> 司馬遷，《史記》，卷 80，〈樂毅列傳〉，頁 2940。

<sup>105</sup> 同前引，卷 74，〈孟子荀卿列傳〉，頁 2838。



眾多著名的稷下先生「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而且闡明其主旨意圖，留下著作，可見黃老之學在稷下學宮盛極一時的情況。<sup>106</sup> 出土的材料也加強稷下學宮與黃老之學有密切關係的論點，很多研究者據此指出黃老之學與稷下學宮的密切關係，<sup>107</sup> 甚至強調田齊與黃老之學的關係。<sup>108</sup> 雖然另有研究者主張戰國時南北各有黃老學的發展，<sup>109</sup> 但田齊是黃老之學的重要據點與傳播區殆無可疑。

齊國有孤立主義的傳統，有強烈的共同體意識甚至地方意識，在文化上又具有優越地位，風俗習慣也不同，容易形成對中央的離心力。漢帝國肇建，對關東大國齊國的統治方式，絕不能「一用漢法」，推動強硬政策，激起齊地人民如秦帝國時期強烈的反抗。曹參以黃老之術治齊，清靜不擾，是採行尊重齊地的風俗民情，不強力干預既成秩序的放任政策，又能表現對盛行於本土的思想的尊重，以此方式安集百姓，可說是「以齊治齊」的策略與智慧的高度發揮。

曹參相齊，是劉邦在帝國的戰略佈局思維下，在遙遠的關東重鎮擺下的要著，是漢帝國延續戰國以來關東關西對抗的形勢下，企圖將齊國經營為控制關東的支撐點。帶著劉邦交付的任務，具有軍事威望的曹參以黃老之術治齊，是有威而不明用其威，在「安集百姓如齊故俗」的目標指導下，「以齊治齊」策略的具體實現。透過對齊地本土的黃老思想的尊崇，以及尊重齊國特殊性的清靜不擾政策，曹參成功

<sup>106</sup> 熊鐵基根據《史記》所載做了扼要的闡釋，認為黃老之學的產生很難有十分具體的標誌，而稷下黃老倒是一個比較明顯的標誌，而很多託名黃帝的著作，本來就是稷下先生們「發明」的。另外也認為，《經法》四篇（按：即《黃帝四經》，或《黃老帛書》），是總屬於黃老之學的著作。熊鐵基，《秦漢新道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 16-22、37-40。

<sup>107</sup> 例如白奚主張，成熟形態的黃老思想首見於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而《黃帝四經》是稷下之學的早期作品。白奚，〈郭店儒簡與戰國黃老思想〉，收入陳鼓應編，《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簡專號》第 17 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440-454。

<sup>108</sup> 例如郭沫若主張，田齊將黃帝的存在信史化，宣稱黃帝是田氏的始祖，以及田齊、黃帝、黃老之術間的緊密關係。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頁 152-184。安作璋承郭沫若之說，認為田氏政權為維護其合法的統治地位，並爭霸天下，須尋求其歷史根據和思想武器，遂擡出黃帝，宣稱是田氏的始祖；並選擇與田氏祖先同樣出自陳國的老子學說，結合為黃老之學，作為思想武器。安作璋，《秦漢史研究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齊文化與黃老之學〉，頁 277-284。王葆玟主張，《黃帝四經》是早期稷下學的代表作，且在宣王時代成為稷下學的經典，黃老之學則是田齊官方之學說。王葆玟，《黃老與老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 46-63。陳麗桂主張，黃老之學產生於田齊稷下學宮，以黃帝為標誌，去改造田齊故鄉陳國的哲人老子的思想學說，成為領導統御的要領與綱紀。陳麗桂，《漢代道家思想》（臺北：五南圖書，2013），〈黃老道家與齊學〉，頁 21-68。

<sup>109</sup> 例如丁原明主張，戰國時期楚黃老學比稷下黃老學發展更早。丁原明，《黃老學論綱》（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頁 42-72。

爭取齊國人認同，撫綏了齊民，「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有了穩定的齊國，也就穩定了帝國的東方基礎，使齊國成為穩定帝國在關東地區統治的重要力量。平陳豨與平黥布之役，劉邦都相當倚賴曹參率領的齊軍，曹參完成了劉邦託付的重任，發揮了將齊國經營為控制關東的支撐點的關鍵性作用。

曹參相齊是劉邦重要的戰略佈局，然而曹參以黃老之術穩定齊國，其成就可能超出劉邦的估算，他在齊地大致舒緩了關東關西對抗，甚至是中央與地方對抗。曹參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尊重齊國的特殊性，依循「安集百姓如齊故俗」的指導原則，具體落實為以黃老之術治齊，亦即「以齊治齊」的治理方式。後來曹參繼蕭何為漢相，《史記》記載這是劉邦遺命與蕭何推薦，<sup>110</sup> 但曹參在齊相任內以黃老之術穩定齊國，舒緩關東關西對抗的經驗與治績，對帝國東方政策有很大的參考價值，<sup>111</sup> 或許是劉邦與蕭何看重他能繼任為漢相的重要原因。

## 六、結語

本文由東方大國齊國與天下權力中心不同視角互相參照的方式，探討楚漢之際到漢初幾個重要階段的天下變局。

楚漢之際齊國能成為左右天下大局的要角，在於齊地在楚漢之際仍被視為特殊的政治文化圈，齊人有其獨特的自我認同，由此形成強烈的共同體意識。獨特的共同體意識加上現實條件的優厚，是齊國在楚漢之際的變局中具有關鍵力量的憑藉。在此一時期，齊國雖未能奪取號令天下的至尊地位，但在幾次大變局中，都扮演關鍵角色。

在田榮、田橫治齊的時代，田齊曾是可以影響天下大局的關鍵力量，若擺脫孤立主義的思維與作為，齊國有很多機會可以創造自己的命運，並參與天下大局的發展。可惜齊國優越的環境與強烈的區域共同體意識，使田榮、田橫容易滿足於據齊

<sup>110</sup> 司馬遷，《史記》，卷 8，〈高祖本紀〉，頁 487；卷 23，〈蕭相國世家〉，頁 2437-2438。

<sup>111</sup> 孟祥才認為，漢初選擇黃老做為治國的指導原則，雖不能歸功於曹參一人，但他對統治思想和統治政策的自覺選擇和理性把握，比蕭何、張良高明，漢初將黃老之治推向全國是曹參一生最大的貢獻，也是齊地思想家對全國的最大貢獻。孟祥才，〈曹參治齊與漢初統治思想與統治政策的選擇〉，《管子學刊》，4（淄博：1998），頁 71-75。羅新認為，曹參是第一個把黃老之學帶進漢廷，並在政治行動中加以推行的人，其最大貢獻是以不十分明顯的方式，修正蕭何時期的法治傾向，是對「漢承秦制」的繼承與修正。羅新，〈從蕭曹為相看所謂「漢承秦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北京：1996），頁 79-85。

稱雄，自外於天下大局，這是齊地特殊的條件與歷史傳統形成的孤立主義思維的重現。此外，田榮、田橫具有類似戰國時期王國並立的舊世界觀，也強化他們採行據齊自保的路線，缺乏放眼天下的格局。如是，齊國優越的地域條件最後反而限制了田氏兄弟的發展。然而，無法跳脫王國並立的舊世界觀的框架，未意識到歷史即將出現新局，大一統的帝國將悄然確立，所以未有新思維面對，則是時代的制約，是當時很多割據稱雄者的通病，即使「國士無雙」的韓信都無法避免，田榮、田橫未能具有超越時代的眼光，算是舊時代的人必須面對歷史新局的悲劇。

楚漢戰爭後期，逐漸形成以齊地為中心，左右項羽、劉邦成敗的韓信勢力，在策士蒯通的擘畫下，齊國一度有機會成為天下政治權力的中心，中國的天下三分之局可能提早出現。蒯通勸韓信據強齊爭衡天下的三分計，凸顯了齊國足以登上天下政治舞臺中心的雄厚資本，最後由於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可能改變楚漢戰爭結局與歷史發展的三分謀略，遂告胎死腹中。而劉邦在垓下滅項後，立即馳入齊王壁，奪其軍，將韓信改封楚王，也可以看出劉邦對韓信據有強齊的不安。這些事實都證明齊地的人力、物力資源以及地理形勢，確實是爭衡天下的有力憑藉，也是野心家亟想操弄的雄厚資本。當齊國納入朝廷掌控，天下由分裂邁入一統之局已頓行明朗。舊世界觀造成的盲點，讓韓信認為他與朝廷可相安於共天下的政治秩序，未察覺歷史已出現新局，裂土分封的舊世界將逐步消逝，最後慘遭族滅，譜出兔死狗烹的悲歌。韓信政治判斷的盲點，連帶使齊國在楚漢之際的變局中，無法一躍而為天下政治權力的中心，但蒯通勸韓信據強齊爭衡天下的三分計，已充分呈現齊地可以掀翻天地的重要性。

劉邦深知齊國的控制權對帝國穩定關東統治的重要性，剛即皇帝位，就匆忙徙封韓信為楚王。並在執楚王信後，立劉肥為齊王，以曹參為齊相國。劉邦此一安排，是將齊國經營為控制關東的支撐點，用以牽制關東諸侯王勢力，這是漢帝與諸侯王共天下，延續戰國以來關東關西對抗的形勢下重要的戰略佈局。後來劉邦在激烈的平陳豨與平黥布之役，除了關中兵外，最倚賴的就屬曹參統率的齊軍，曹參相齊發揮了預期的關鍵性作用。此外，齊國有強烈的共同體意識甚至地方意識，在文化上又具有優越地位，風俗習慣也不同，容易形成對中央的離心力。曹參以黃老之術治齊，是採行尊重齊地的風俗民情，不強力干預既成秩序的放任政策，又表現對盛行於齊地本土的黃老思想的尊重，以此方式安集百姓，可說是「以齊治齊」的策略與智慧的高度發揮。有了穩定的齊國，也就穩定了帝國的東方基礎。值得注意的是，曹參以黃老之術穩定齊國，其成就可能超出劉邦的預期，他在齊地大致化解

了關東關西的對抗，甚至是中央與地方的對抗。此一舒緩關東關西對抗的經驗與治績，對帝國東方政策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或許是劉邦與蕭何看重他能繼任為漢相的重要原因。

田餘慶總結秦漢之際的歷史走勢，謂：「一是非張楚不能滅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漢。」並認為立張楚意味以楚反秦，導致各諸侯王在反秦旗幟下效尤競立，以至於動搖剛剛樹立的統一理念。淵源於楚的劉邦東向與諸侯盟主楚王交鋒之時，不期而然地居於當年秦始皇滅六國的地位。反秦又不得不承認秦而出現的漢承秦制，首先又最根本的是承秦帝制。<sup>112</sup> 楚漢之際到漢初諸用齊者對齊國處於天下變局中的戰略思考，放到此一歷史背景中檢視，隱隱然也與此一歷史走勢相呼應。田榮、田橫據齊自保的孤立主義路線，雖是齊地特殊的條件與歷史傳統形成的孤立主義思維的重現，但其具有類似戰國時期封建王國並立的舊世界觀，卻也是當時諸侯王在反秦旗幟下效尤競立的一環，只是田氏兄弟的孤立主義路線走得更為極端罷了。至於韓信安於齊、滿足於齊，未察覺歷史已出現新局，裂土分封的舊世界秩序將逐步消逝，未採行蒯通據強齊爭衡天下的三分計，遂譜出兔死狗烹的悲歌。韓信由舊世界觀而來的對自己政治角色定位的錯誤認知，依然是當時諸侯王在反秦旗幟下效尤競立的一環。至於劉邦在楚漢戰爭中，憑藉秦之故資，形勢上今日之漢即昔日之秦，是秦統一天下歷史的重演，他在政治路線上也逐步走上秦滅六國建立統一帝國的道路。劉邦的成功，也反映出田氏兄弟與韓信認為王國並立是穩定的政治秩序的舊世界觀，已無法面對歷史的新局。

透過對楚漢之際到漢初這個急遽變化時代的三個重大事件的解讀，齊國此一爭衡天下的重要力量被凸顯了，田氏兄弟與韓信用齊的得失，以及曹參相齊的意義也得到進一步的理解與詮釋，而聚焦於關中權力中心的傳統歷史詮釋也得到不同視域的補充。齊地優越的環境與強烈的共同體意識的憑藉，使齊國在亂世易於割據獨立，但也容易使據齊者產生孤立主義的思維，滿足於據齊稱雄，自外於天下大局，這是齊地特殊的條件與歷史傳統形成的特色，值得治史者注意。

當然，在朝廷尚未能完全控制諸侯王之前，齊國左右天下大局的影響力還會延續下去，揭開剷除諸呂政變序幕的，正是齊哀王劉襄 (?-179 B.C.) 在呂后過世 (180 B.C.) 後立即起兵西征，覬覦神器。軍功集團要角陳平、周勃 (?-169 B.C.)，趁諸呂面對諸侯王討伐，去留猶豫不決的機會，迅速發動政變，奪取北軍，擊殺呂產 (?-180 B.C.)，盡誅諸呂。軍功集團迅速掌控局面，並反對立齊王為天子，齊國

<sup>112</sup> 田餘慶，〈說張楚〉，頁 3-29。

落得為人作嫁，但勝利果實卻由寸功未立的代王劉恆（180-157 B.C. 在位）接收，齊國與朝廷的矛盾愈來愈深，離心力開始強烈醞釀。濟北王劉興居（?-177 B.C.）「自以失職奪功」，<sup>113</sup> 對朝廷產生離心力，以區區濟北，率先發難，兵敗自殺。<sup>114</sup> 景帝（157-141 B.C. 在位）時爆發了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諸齊加入的七國之亂，亂事之起雖有其它重要因素，但齊國一系自悼惠王劉肥、哀王劉襄、濟北王劉興居、城陽王劉章（178-177 B.C. 在位）等幾代環繞著「失職奪功」產生的不滿與積怨，也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叛作一總清算。如果從齊國的視角檢視這一段歷史，可重新詮釋者尚多，然已超出本文範圍，當俟諸異日。

（責任校對：孔令安）

<sup>113</sup> 「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司馬遷，《史記》，卷 52，〈齊悼惠王世家〉，頁 2424。

<sup>114</sup> 阿部幸信認為，淮北集團（案：即淮泗集團）從氣質上來說並不喜歡各種政治性規治。他們催生了由諸侯王國各自保持其原有地域性的「地域型」系統。劉興居叛亂雖失敗，但影響仍大，迫使文帝必須暫時維持對匈奴的綏靖政策和與諸侯王的「共天下」系統。此一論點可與本文討論涉及的漢初中央與地方王國的關係參看。阿部幸信著，徐冲譯，〈「統治系統」論的射程〉，《早期中國史研究》，3.1（臺北：2011），頁 137-154。譯自《日本秦漢史研究》，11（東京：2011）。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司馬遷 Sima Qian, 《史記》*Shi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3, 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 *Dianjiaoben ershisishi xiudingben*。
- 吳見思 Wu Jiansi 評點, 《史記論文》*Shiji lunwen*, 臺北 Taipei: 臺灣中華書局 Taiwan zhonghua shuju, 1970。
- 呂祖謙 Lü Zuqian, 《兩漢精華》*Lianghan jinghua*, 收入黃靈庚 Huang Lingeng、吳戰壘 Wu Zhanlei 主編, 《呂祖謙全集》*Lü Zuqian quanji* 第 7 冊, 杭州 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08。
- 林伯桐 Lin Botong, 《史記蠡測》*Shiji lice*, 收入張新科 Zhang Xinke 主編, 《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Shiji wenxue yanjiu dianji congkan* 第 1 輯, 西安 Xi'an: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Shanxi shifan daxue chuban zongshe, 2015。
- 范曄 Fan Ye 撰, 李賢 Li Xian 等注, 《後漢書》*Houhan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0。
- 班固 Ban Gu 撰, 顏師古 Yan Shigu 注, 《漢書》*Han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2。
- 凌稚隆 Ling Zhilong 輯校, 李光縉 Li Guangjin 增補, 有井範平 Arie Norihira 補標, 《補標史記評林》*Bubiao Shiji pinglin*, 臺北 Taipei: 地球出版社 Diqu chubanshe, 1992。
-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Zhangjiashan er si qi hao hanmu zhujian zhengli xiaozu 編著,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 *Zhangjiashan hanmu zhujian 'er si qi hao mu' (shiwen xiudingben)*, 北京 Beijing: 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 2006。
- 陳亮 Chen Liang, 《陳亮集》*Chen Liang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4。
- 曾國藩 Zeng Guofan, 《求闕齋讀書錄·史記》*Qiuquezhai dushu lu, Shiji*, 收入張新科 Zhang Xinke 主編, 《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Shiji wenxue yanjiu dianji congkan* 第 1 輯, 西安 Xi'an: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Shanxi shifan daxue chuban zongshe, 2015。
- 賈誼 Jia Yi 撰, 閻振益 Yan Zhenyi、鍾夏 Zhong Xia 校注, 《新書校注》*Xinshu jiaoz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0。

- 劉 向 Liu Xiang 集錄，《戰國策》*Zhanguoce*，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8。
- 瀧本弘之 Takimoto Hiroyuki 編，《全相平話五種》*Quanxiang pinghua wuzhong*，《中國古典文學插畫集成》*Zhongguo gudian wenxue chahua jicheng* 第6冊，東京 Tokyo：遊子館 Yushikan，2009，《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Zhizhi xinkan quanxiang pinghua Sanguozhi* 三卷，元建安虞氏刊本 Yuan Jian'an Yushi kanben。

## 二、近人論著

- 丁原明 Ding Yuanming，《黃老學論綱》*Huanglao xue lungang*，濟南 Jinan：山東大學出版社 Shandong daxue chubanshe，1997。
- 工藤元男 Kudo Motoo 著，廣瀨薰雄 Hirose Kunio、曹峰 Cao Feng 譯，《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Shuihudi qinjian suojian qindai guojia yu shehu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0。
- 王子今 Wang Zijin，《秦漢區域文化研究》*Qin Han quyu wenhua yanjiu*，成都 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1998。
- 王葆琰 Wang Baoxuan，《黃老與老莊》*Huanglao yu laozhuang*，北京 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2012。
- 白 奚 Bai Xi，〈郭店儒簡與戰國黃老思想〉“Guodian rujian yu Zhanguo huanglao sixiang”，收入陳鼓應 Chen Guying 編，《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簡專號》*Daojia wenhua yanjiu: Guodian chujian zhuanhao* 第17輯，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1999，頁440-454。
- 田餘慶 Tian Yuqing，《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Qin Han Wei Jin shi tanwei (chongding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1，〈說張楚〉“Shuo Zhang Chu”，頁3-29。
- 安作璋 An Zuozhang，《秦漢史研究文集》*Qin Han shi yanjiu wenji*，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15，〈齊文化與黃老之學〉“Qi wenhua yu huanglao zhi xue”，頁277-284。
- 李偉泰 Li Weitai，《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論述稿》*Hanchu xueshu ji Wang Chong Lunheng lunshugao*，臺北 Taipei：長安出版社 Chang'an chubanshe，1985，〈試論漢初「秦本位政策」的成立〉“Shilun hanchu ‘Qin benwei zhengce’ de chengli”，頁1-22。
- 李開元 Li Kaiyuan，《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Han diguo de jianli yu Liu Bang jituan: jungong shouyi jiecheng yanjiu*，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00。

- 孟祥才 Meng Xiangcai, 〈曹參治齊與漢初統治思想與統治政策的選擇〉“Cao Shen zhi Qi yu hanchu tongzhi sixiang yu tongzhi zhengce de xuanze”, 《管子學刊》 *Guanzi xuekan*, 4, 淄博 Zibo: 1998, 頁 71-75。
- 林聰舜 Lin Tsung-shun, 〈韓信的〈漢中對〉——高明的政治謀略與致命的舊世界觀之表露〉“Han Xin de ‘Hanzhongdui’: gaoming de zhenzhi moulue yu zhiming de jiu shijie guan zhi biaolu”, 收入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 Shanxisheng Sima Qian yanjiuhui 編, 《司馬遷與史記論集》 *Sima Qian yu Shiji lunji* 第 8 輯, 西安 Xi’an: 陝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2008, 頁 88-101。
- 林麗娥 Lin Li-e, 《先秦齊學考》 *Xianqin qixue kao*,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92。
- 阿部幸信 Abe Yukinobu 著, 徐冲 Xu Chong 譯, 〈「統治系統」論的射程〉“‘Tongzhi xitong’ lun de shecheng”, 《早期中國史研究》 *Zaoqi Zhongguo shi yanjiu*, 3.1, 臺北 Taipei: 2011, 頁 137-154。譯自《日本秦漢史研究》 *Riben Qin Han shi yanjiu*, 11, 東京 Tokyo: 2011。
- 侯仁之 Hou Renzhi, 《歷史地理學的視野》 *Lishi dili xue de shiye*,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09, 〈淄博市主要城鎮的起源和發展〉“Ziboshi zhuyao chengzhen de qi yuan han fazhan”, 頁 399-448。
- 徐復觀 Xu Fuguan, 《兩漢思想史卷三》 *Lianghan Sixiang shi juan san*,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 2002, 〈史漢比較研究之一例〉“Shi Han bijiao yanjiu zhi yi li”, 頁 459-552。
- 高明士 Gao Ming-shi, 《中國中古政治的探索》 *Zhongguo zhonggu zhengzhi de tansuo*, 臺北 Taipei: 五南圖書 Wunan tushu, 2006, 〈導言——漢唐間為「中古」的初步看法〉“Daoyan: Han Tang jian wei ‘zhonggu’ de chubu kanfa”, 頁 1-13。
- 孫家洲 Sun Jiazhou, 〈論秦漢時期齊魯文化的歷史地位〉“Lun Qin Han shiqi Qi Lu wenhua de lishi diwei”,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Zhongguo renmin daxue xuebao*, 4, 北京 Beijing: 2001, 頁 107-113。
- 張龍海 Zhang Longhai、朱玉德 Zhu Yude, 〈臨淄齊國古城的排水系統〉“Linzi qiguo gucheng de paishui xitong”, 《考古》 *Kaogu*, 9, 北京 Beijing: 1988, 頁 784-787。
- 郭沫若 Guo Moruo, 《十批判書》 *Shi pipanshu*, 北京 Beijing: 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 1956, 〈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Jixia huanglao xuepai de pipan”, 頁 152-184。



- 陳麗桂 Chen Li-gui, 《漢代道家思想》*Handai daojia sixiang*, 臺北 Taipei: 五南圖書 Wunan tushu, 2013, 〈黃老道家與齊學〉“Huanglao daojia yu qixue”, 頁 21-68。
- 陳蘇鎮 Chen Suzhen, 《《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Chunqiu yu 'handao': lianghan zhengzhi yu zhengzhi wenhua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1。
- \_\_\_\_\_, 《兩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幽》*Lianghan Weijin Nanbeichao shi tanyou*,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13, 〈「天下苦秦」辨〉“Tianxia ku Qin' bian”, 頁 3-14。
- 勞 榦 Lao Gan, 《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Gudai Zhongguo de lishi yu wenhua*,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2006。
- 葛劍雄 Ge Jianxiong, 〈論秦漢統一的地理基礎〉“Lun Qin Han tongyi de dili jichu”, 收入中國秦漢史研究會 Zhongguo Qin Han shi yanjiuhui 編, 《秦漢史論叢》*Qin Han shi luncong* 第 6 輯, 南昌 Nanchang: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jiaoyu chubanshe, 1994, 頁 127-145。
- 群 力 Qun Li, 〈臨淄齊國都城勘探紀要〉“Linzi qiguo ducheng kantan jiyao”, 《文物》*Wenwu*, 5, 北京 Beijing: 1972, 頁 45-54。
- 楊 建 Yang Jian, 《西漢初期津關制度研究: 附《津關令》簡釋》*Xihan chuqi jinguan zhidu yanjiu: fu Jinguanling jian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0。
- 黎明釗 Li Mingzhao, 〈津關令與江湖盜賊〉“Jinguanling yu jianghu daozei”, 收入黎明釗 Li Mingzhao 編, 《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Handiguo de zhidu yu shexue zhixu*, 香港 Hong Kong: 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jiu daxue chubanshe, 2012, 頁 365-408。
- 增淵龍夫 Masubuchi Tatsuo 著, 孔繁敏 Kong Fanmin 譯, 〈漢代民間秩序的構成和任俠習俗〉“Handai minjian zhixu de goucheng han renxia xisu”, 收入劉俊文 Liu Junwen 主編, 《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Riben xuezhe yanjiu Zhongguo shi lunzhu xuanyi* 第 3 卷,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3, 頁 526-563。
- 熊鐵基 Xiong Tieji, 《秦漢新道家》*Qin Han xindaojia*,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1。
- 錢 穆 Qian Mu, 《史記地名考》*Shiji diming kao*, 收入《錢穆先生全集(新校本)》*Qian Mu xiansheng quanji (xinjiaoben)*, 北京 Beijing: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chubanshe, 2011。

- 羅 新 Luo Xin, 〈從蕭曹為相看所謂「漢承秦制」〉“Cong Xiao Cao weixiang kan suowei ‘Han cheng Qin zhi’”,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Beiji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5, 北京 Beijing: 1996, 頁 79-85。
- 嚴耕望 Yan Gengwang, 《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Yan Gengwang shixue lunwen xuan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9, 〈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兼論秦統一天下之背景〉“Zhanguo shidai lieguo minfeng yu shengji: jianlun Qin tongyi tianxia zhi beijing”, 頁 505-523。

## **The Qi Domain's Perspective: An Analysis of Several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hu-Han Conflict to the Early Han**

**Lin Tsung-sh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slin@mx.nthu.edu.tw

###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eriod between the fall of the Qin and the rise of the H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i 齊 domain, seeking to determine the role Qi played in this momentous historical event.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studies, which focus exclusively on the Guanzhong 關中 area, the use of this perspective sheds light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and central authorities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inside (central) to outside (local),” the adoption of the Qi domain’s perspective reveals how the operation of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fluence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begins by discussing why the Qi domain had the power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t this decisive historical moment. It then advanc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Chu-Han conflict and the early Han by analyzing three important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in Qi. This analysi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Qi, sheds light on the propriety of the actions of the Tian brothers and Han Xin 韓信, and explicates the effects of Cao Shen 曹參’s conduct as prime minister. In addition, the traditional explanation for these events, which focused on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n Guanzhong, is reinterpreted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Qi’s extraordinary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enabled the domain to remain independent and isolated in troubled times, and that Qi’s unique circumstances are worthy of historical inquiry.

**Key words:** the transition from Chu to Han, the Qi domain's perspective, Tian Heng 田橫, Kuai Tong 蒯通, Han Xin 韓信, Cao Shen 曹參

(收稿日期：2015. 12. 1；修正稿日期：2016. 3. 20；通過刊登日期：2016. 6. 7)